

Creating Chinese Ethnicity

Subei People in Shanghai, 1850-19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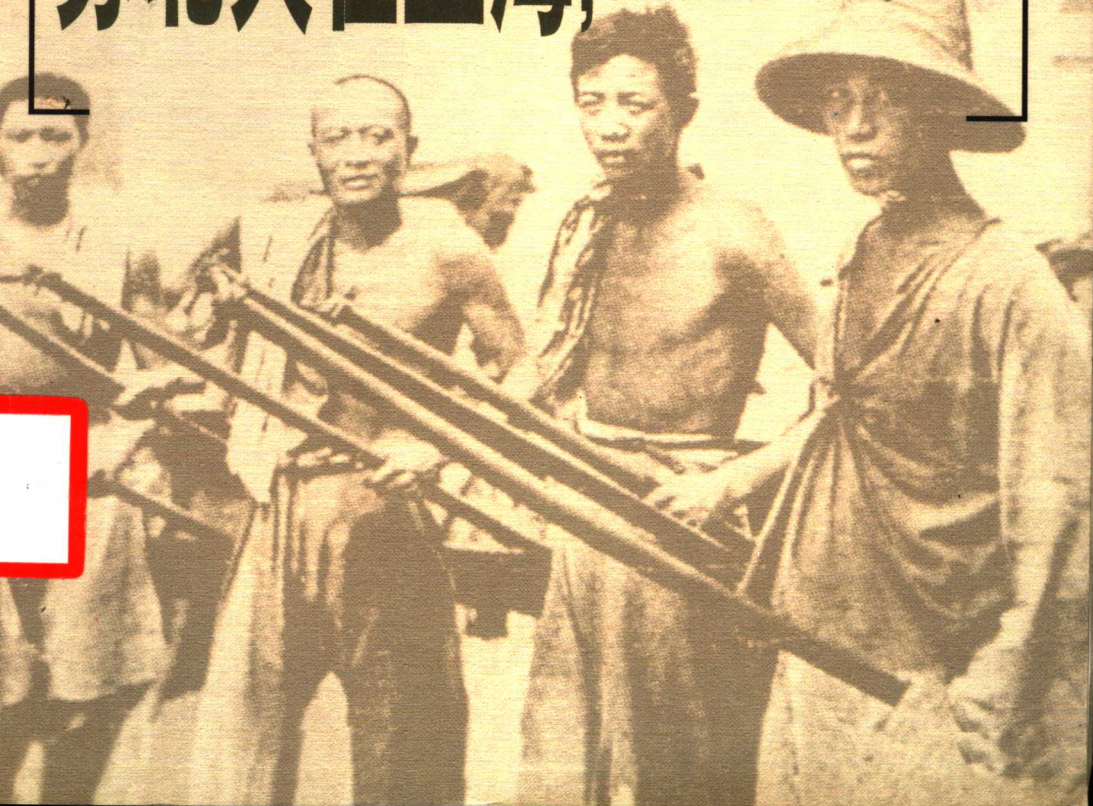
The Series of Translation concerning Shanghai History

上海史研究译丛

[美] 韩起澜(Emily Honig)/著 卢明华/译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远东出版社

苏北人在上海, 1850-1980



Creating Chinese Ethnicity

Subei People in Shanghai, 1850-1980

The Series of Translation concerning Shanghai History

[美] 韩起澜(Emily Honig)/著 卢明华/译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远东出版社

苏北人在上海, 1850-198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苏北人在上海: 1850~1980/(美)霍尼格著;卢明
华译.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8

(上海史研究译丛)

ISBN 7-5325-3867-2

I. 苏... II. ①霍...②卢... III. 社会生活-史料
-上海市-1850~1980 IV. K29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76277 号

Emily Honig

Creating Chinese Ethnicity: Subei People in Shanghai, 1850~1980

© 1992 Yale University Press

本书据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译出

上海史研究译丛

苏北人在上海, 1850—1980

[美]韩起澜 著

卢明华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发行

上海远东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l@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18 印张 8 $\frac{4}{18}$ 插页 5 字数 152,000

2004 年 8 月第 1 版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100

ISBN 7-5325-3867-2

K·632 定价: 1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公司管理部联系。T: 56628900×813

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规划项目
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城市研究”重点学科项目

《上海史研究译丛》编委会

顾问：

张仲礼 陈 绛 魏斐德(美)

编委(按姓氏笔画排列)：

马 军	马学强	卢汉超(美)	叶文心(美)
叶凯蒂(德)	毕可思(英)	安克强(法)	张晓敏*
周 武	周育民	高纲博文(日)	梁元生(香港)
熊月之*	黎志刚(澳)		

有*者为执行编委

执行编辑：张晓敏 吕 健

本书特约编辑：汪 宇

本书责任编辑：殷卫星 吕 健

美术编辑：黄 琛

技术编辑：富 强

《上海史研究译丛》

前 言

上海这座城市，既饱经沧桑，给人以复杂的历史感，又生机勃勃，给人以常新的时代感。用得着一句老话：“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上海史研究，历来备受学术界关注，海外学者更是情有独钟。即使不算一百五十年前麦都思对上海历史的简单描述，也不算稍后麦克莱伦的《上海史话》、裘昔司的《历史上的上海》，单从 1921 年、1923 年寓沪英国学者兰宁、库寿龄共同推出的功力深厚的两大卷《上海史》算起，海外学者对上海史的研究已有 80 个年头了。尤其最近二十多年，海外上海史研究更明显呈现“四多”，即项目多、会议多、成果多、人才多。在美国，西部伯克利、洛杉矶、俄勒冈，东部康乃尔、哈佛，北部密西根，都各有学者在研究上海史。日本、德国、法国、英国、奥地利、澳大利亚，我国的香港、台湾，也都有学者在从事上海史研究。日本有上海史研究会之设。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因研究上海史人多势众，在美国学术界曾有“上海帮”之谑称。

上海史已是海外汉学界公认的热门话题，堪称显学。

海外学者究竟发表过多少关于上海史的著作，难以确计。据不完全统计，自 1980 年代以来，美、德、法、英、日等国关于上海史的博士论文已有不下三百篇，正式出版的上海史著作不下五十部。

上海史是内蕴极丰的富矿，开采眼光、冶炼技巧因人而异，其产品自然也多姿多彩。有的对社会史、文化史感兴趣，有的对政治史、经济史感兴趣；有的纵贯古今，有的横跨多门；有的以资料翔实著称，有的以议论充当见长。他们共同构成上海史园地的繁盛景观。

上海史早已是一门国际性的学问,翻译海外上海史研究成果是上海史学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城市史、近代史、社会史、文化史、经济史等学科建设也有积极意义。《上海史研究译丛》遂应时推出。

本丛书所选各书,是我们接触到的优秀著作中的一部分。还有一些书颇具价值,但或因已有中文译本,或因翻译版权联系未妥,未能列入。遗珠之憾,尚望鉴谅!

本丛书编委会成员除了上海的学者,还包括美国、德国、法国、英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家和香港的学者,他们都是上海史研究专家。在《译丛》组织出版的过程中,他们帮助推荐作品、联系版权、校订译文,付出了很多劳动。

本丛书具体翻译工作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组织。

张仲礼、陈绛、魏斐德(美)三位著名学者多年从事上海史研究,欣然担任《译丛》顾问,帮助规划全局、解决疑难问题,使丛书增色不少。编委会特此表示感谢。

《上海史研究译丛》编委会

前 言

本书论述上海的族群，撰写该书起意于得克萨斯州的埃尔帕索城。1977年，我初次来到埃尔帕索，同两位朋友一道，从事对卷入1972—1974年法拉制造公司罢工的奇卡纳*女工的口述史研究工作。罢工期间奇卡纳女工形成的联合组织令人印象深刻。听说这次罢工也被描绘成奇卡纳和墨西哥的女工之间的分裂和对抗，起初感到困惑。我们在1978年和1979年回头进行深入访谈时发现，这些分裂派系夹杂着埃尔帕索那样的边城中所具有的族群含义。我在1979年来到上海时，我们在埃尔帕索采访过和交了朋友，并试图解开她们团结和摩擦之谜的妇女们在我脑海里记忆犹新，我那时去上海花了两年时间研究棉纺厂女工史。也许是无意识地，在埃尔帕索令我全神贯注的问题影响了我的研究，因为不无巧合的是，上海女工内部（特别是来自江苏省北半部和南半部的女工之间）的分隔，成为本研究的主导旋律。长江之分隔江苏，令人回想起（至少对我来说是如此）格兰德河所代表的分隔，该河把埃尔帕索同墨西哥一侧毗邻华雷斯城的区域分隔开。根据上海的以原籍为基础的分隔的最初提示，我加紧采访和阅读文件资料以探索这种分隔对女工生活的含义和对阶级意识和政治组织的发展的影响。

在研究女工史有关的方方面面中，基本问题依然无法回答，这关乎来自江苏南北两个地区的人们之间分隔的根源，尤其是江苏北部土生土长的人

* 奇卡纳(Chicana)，指居住在美国的墨西哥妇女。——译者注

即苏北人的低微地位的根源。有两点认识使我有志于对这个问题追根究底：第一，分隔并不限于棉纺厂，而且事实上构建了整个上海的社会和经济等级结构；第二，这种分隔——以及对苏北人的偏见在1949年社会主义革命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依然存在。^{*}于是，本书刚开始时试图分析在上海的这种偏见的根源。起初我设想我要构思一部关于上海苏北人的历史。

有关苏北人资料的极度贫乏好几次几乎使我放弃这个项目。但最迫使我我想放弃的是在我已经工作了好几年之后才吃惊地认识到，根本不存在关于苏北或苏北人的明确定义。我一直以为，我的大多数知情人也都以为，谁是苏北人是一目了然的。然而，在我开始调查时，我发现苏北并不是一个客观的、明确界定的地区，而是代表一种关于某一特定地区同质同类的信念。该地区可以包括整个江苏北半部，也可以仅指某些部分；它可以包括邻省山东、安徽的一些地区以及江苏南半部某些地区，就看你问谁了。它可以按地理、语言或经济状况来界定，但是每一种界定都产生即使不相互矛盾也差别很大的定义。我的课题，以及我的消息来源的可靠性在我眼底仿佛化作了云烟。

我没有中止我的研究，这种令人不安的认识最终反而改变了我。从那时起，我不再殚精竭虑去拼凑上海苏北人正史了，而是去探讨苏北人这一类别藉以建构的过程及其所发挥的功能。在我开始把籍贯（例如，苏北人的籍贯）看作社会建构的类别时，也开始考量籍贯怎样表现族群含义的方式。我愈来愈明白，至少在上海，原籍界定了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在美国历史上一向被认为是族群关系，这种分析以前从未应用于中国，也许是因为压倒多数的人口都是汉族身份之故吧。于是，本研究最终没有成为关于上海底层社会形成的研究，而是成了关于创立中国族群学的研究。

本书并不僭称是上海苏北人的全史，也不按编年次序编排。相反，每一章都探讨苏北族群被建构和争议的历史场合。导论之后的三章聚焦于精英集团对苏北人这个社会类别的建构。第二章探索同苏北有关的种种含义，分析其作为社会类别之产生以回应江苏北半部移民来到江南和上海。上海的苏北移民群体的形成和上海当局把这个群体边缘化的企图是第三章的主题。第四章聚焦于苏北人在上海从业经历，分析劳工市场如何产生族群，又

^{*} 作者描述的是1980年以前的情况，应该看到，随着上海的改革开放，大量外来人口的迁入，这种偏见的影响已经越来越小。——编者注

如何受族群的影响。第五章将我们的视角转向苏北人本身,探索他们如何建构他们自己在上海的身份,如何抗争和抵制精英集团炮制的通称为苏北的身份。1932年日本进攻上海,独一无二的历史瞬间出现了,在那时,苏北人的地位成为公众辩论的主题,社会类别史无前例地遭到冷遇和受到挑战,这是第六章的主题。尽管头几章全都聚焦于晚清和民国时期,第七章则论述1949年以后一段时间苏北族群之继续存在和对之进行的商讨,第八章也是本书最后一章,是对籍贯的族群涵义方面的反思。

社会类别的含义以往被认为是不言而喻的,我质疑社会类别的目的产生了一个术语学问题:如何指涉我所要描述其历史的那个人群。我在本书从头到尾使用苏北这一术语来指涉江苏北半部,即从长江至淮河古道之间的内核地区,苏北人则指该地区的居民。当我使用苏北这个措辞时,系指那些在上海被称为苏北佬的人,而不论其确切的出生地在哪里。我如此用词是希望苏北一词被理解为一个复合名词——既是现实的地方又是想象之地,既是实际的类别,又是社会建构的类别。

在上海,最通常用来指涉江苏北部的是江北而不是苏北。事实上,许多上海人一听说我在研究苏北人就好奇地看着我;他们一听到江北这个术语,我的主题便明白了。我使用苏北这个术语是因为江北这个术语在上海已成为贬词,即使在以前也许并非如此。

我感谢许多朋友和同事对本项目的贡献。最重要的是感谢他们鼓励我坚持不舍。我特别感谢丽莎·罗菲尔在我十分确信我的课题已经告吹时帮助我认清了更加令人振奋的种种可能的思路。戴安娜·怀利花费很多精力在纽黑文听取了我关于籍贯族群的最初步的想法并对此提出批评意见。在我动手写书时,克里斯蒂娜·吉尔马丁、卡马丽塔·欣顿、贺萧、玛丽琳·杨以及丽莎·罗菲尔投身到我的大部分马拉松式的星期六会议来讨论我的作品。他们逐字逐句地阅读和评点数易其稿的本书各章,易稿次数之多是我们在其中任何一位可能留心记忆所不及的。

另有许多人也对本项目作出了贡献。裴宜理和苏珊·曼不仅极其慷慨地让我分享了他们拥有的有关上海工人的资料,而且还对整部手稿提出了详尽的评点。我也感谢德博拉·戴维斯、史景迁和凯思林·伯恩哈特阅读和评论了本书最后一稿。戴维·蒙哥马利提供了取之不尽的例证。多年来,许多同事拨冗莅临饭局和会议讨论有关苏北人的理念和提供知情人线

索,他们是:马斯顿·安德森,比阿特丽斯·巴特利特,周锡瑞,哈罗德·卡恩,詹姆斯·李,托马斯·罗斯基,海伦·苏,王晓光(音),莱曼·范·斯莱克,魏菲德,杰弗里·沃塞斯特罗姆,埃伦·威德默,朱迪思·蔡特林。瓦莱里·汉森贡献了她研究宋代的经验,她帮助我正确地分析有关资料方面的问题。迈凯拉·迪莱昂纳多慷慨地贡献了她在有关族群的人类学文献研究方面的专长。

然而,倘若不是上海诸多人士慷慨襄助,恐怕永远不会有这份书稿,要不是美国的朋友和同事们的批评指正,恐怕连主意也不会有。我首先要感谢上海的那些同意我采访的苏北人。上海社会科学院协办了我的研究工作,院外办的工作人员,特别是赵年国(音),常常竭尽全力安排访谈。我感谢筱文艳、马绪英(音)和上海淮剧团的成员帮助安排了一次令人难忘的苏北之行。我在上海期间,邓玉芝(音),许新武(音),薛淑珍(音),陈振年(音)对我的研究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支持和帮助。

好几项学术基金使我有可能是从事这项研究。这些学术基金来自人文科学全国捐赠基金会、王氏中国问题研究所、耶鲁国际与地区研究中心、耶鲁大学格里斯沃尔德基金会。这些资助使我得以借重赵晓江(音)、申晓红、梁侃的非常宝贵的研究襄助。在耶鲁大学出版社,查尔斯·格伦奇给予精神上的支持,有时还悄悄提醒,这正是我所期盼于一位编辑的。劳伦斯·肯尼对手稿作了仔细的校订。杰里·登纳林代表出版社对手稿所作的真知灼见的评点促使我对自己的分析精益求精。

有几位人士对本项目作出了不那么直接但还是很有意义的贡献。我感谢莉莎·菲奥尔—马塔和路易丝·默里提供了纽约市西区的一套公寓房间,使我能花一个星期对本书的尾章作了反复思考;伊迪丝·赫德提供了一所可以眺望旧金山的房子,使我在那里修改定稿;也要谢谢罗莎和梅娅自己玩耍讲故事;莉西娅·菲奥尔—马塔拓展了我在思想上和地理上的想象力。最后,从我俩 1977 年前往埃尔帕索起,历经无数次去中国的研究之旅,贺萧始终是一位孜孜不倦的严峻的批评者,同时也是一位任何时候都可以依靠的朋友。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导论	1
第二章 寻觅苏北	18
苏北其地	19
苏北：其理念	25
第三章 从移民变为族群	35
从苏北到江南	35
上海的客民	38
棚户区的斗争	41
争夺的领域：争夺上海文化	47
第四章 族群因素的作用：上海劳工市场中的苏北人	56
上海劳工市场的地区性质	56
籍贯等级结构的根源	63
第五章 有争议的族群：苏北人的自我认同	75
同乡会	76
自我认同	78
第六章 偏见政治	88
苏北人的团结	92
第七章 无形的不平等：1949年后上海的苏北人	97

当代上海的傲慢与偏见	98
不平等的结构	105
第八章 籍贯的族群涵义	111
参考文献	118
译后记	139

第一章

导 论

这是一部关于原籍而不是种族、宗教或国籍怎样逐步界定中国条件下的族群身份的历史。这种情况犹如非洲裔美国人和奇卡纳、波兰人、意大利人的身份在美国一向被视为族群一样确定无疑。本书所写的苏北人，其家庭源自江苏省长江以北地区，该书涉及中国的原籍族群的社会建构和社会含义。

自 19 世纪晚期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作为居住在上海的一名苏北人，就意味着他是穷人。多半是由于洪水、饥荒或家乡的战争而逃难的难民，苏北人在上海所从事的职业是最不赚钱、最差强人意的营生。他们占了不熟练劳工队伍的大多数——黄包车夫、码头工人、建筑工人、拉粪车工、运垃圾工、理发匠、澡堂侍者。大多数苏北人居住在该市边缘的贫民窟里，用芦苇麦秸、纸板和能够找到的随便什么废料搭盖棚屋。

部分地是由于穷，苏北人成为偏见和歧视的对象。他们穿的红红绿绿的褂子让人发笑，嘴里一股大蒜味，人皆趋避，操着一口苏北方言受人取笑。苏北文化在清代中期被认为是高雅隽永的象征，到 19 世纪晚期渐渐被视为低级鄙俗。从 20 世纪早期起，称呼某人为苏北猪猡就意味着这个人即使实际并非来自苏北也是穷困、无知、肮脏和鄙俗的。

大多数苏北人生活的聚居区被认为是粗野的地区，父母告诫他们的孩子不要进去。大学毕业生最怕日后被分配到苏北居民区里的学校去教书。最后，谁也不希望同苏北人结婚。年轻人，包括苏北家庭出身的年轻人出去找对象，几乎总是指明对象不要是苏北人。

对苏北人的偏见如此冥顽不化,以致已经移居出去的上海人也把它传输出去,加以再创作,赋予新的含义。例如,一位在解放前上海家境殷实的老年妇女解释道,每当她在纽约乘地铁想要抱怨波多黎各人或非洲裔美国人的行为时,就把他们说成是苏北人,这位妇女在纽约生活了好多年。她相信她用这种方式可以避免被人说是种族主义者而受到攻击的可能性。

对苏北人的偏见是那样溢于言表,上海人又是那样坦率地直认不讳,这对于在上海的西方观察家和历史学家多半是觉察不到的。他们更关注以阶级差别和性别差异为基础的不平等和对抗而忽视那些由籍贯所界定的不平等和对抗。^①而且,在上海这座移民城市里,籍贯构筑了社会等级结构,形成了傲慢与偏见的流行意识。本书不仅旨在分析一个移民群体即苏北人的历史经验,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揭示身份、偏见和社会矛盾的根由,这些是中国城市居民的核心问题,在中国条件下可能建构族群。

苏北人在上海的经历直接使人想起同那些族群身份很少受到怀疑的集团作跨文化比较。乍看起来,苏北人的贫困和对苏北人的偏见似乎很像美国的少数族群如非洲裔美国人、奇卡诺、波多黎各人和亚裔美国人的经历。然而,苏北人同这些族群不同,他们在形体上同其他上海人没有什么区别,他们几乎全是汉族人。尽管精英集团可以对待苏北人如不同种族,但事实上只有方言才能把他们区别开。

移居美国的白人移民,例如19世纪早期因马铃薯荒而逃荒的爱尔兰人可以用作较接近的类比,在新英格兰的城市中,如同在伦敦、曼彻斯特和利物浦等英国城市中一样,爱尔兰移民生活在单独的街区里,他们被人瞧不起,从事本地人不愿为之的营生。^②爱尔兰人虽然同苏北人一样有着以移民为基础的身份,但又是一个在很大程度上以国籍界定的族群:他们来自一个国家,其文化传统和历史无可否认地不同于他们新家园的文化传统和历史。而且,要确定谁是爱尔兰人不成问题:很简单,爱尔兰人就是来自爱尔兰的人。

苏北人就不是这样。他们不是跨越国界而来的移民,苏北也不是一个有着一目了然或能直截了当定义的地方。苏北这个名称既不是指一个城市、专区,也不是指一个省份,而是指一个地区,其区界和内核是争议未定的。因此,同美国的以种族或原国籍界定的族群集团有所不同,苏北人的经历类似于那些由地区差别界定的族群,如阿巴拉契山脉的“山区人”,他们定

居在北方的城市里,又如移居加利福尼亚的西南部“俄克佬”^{*}。

至少从表面上看,满可以把苏北人称为上海的俄克佬。同苏北人一样,俄克佬也来自这样的地区,其地区内聚力仅仅是为了应对来自其他地区的移民才形成的。这个地区并非依俄克拉荷马这个州名所表示的州界来划定的,而是包括了得克萨斯、阿肯色和密苏里诸州的部分地区。在 20 世纪 30 年代有名的干旱沙暴地区移民即他们的成千上万的老乡在加利福尼亚的中央谷重新落户之前,谁也没想像不到这 4 个州竟建构了一个地区。作为移民,他们完成了加利福尼亚本地人不愿干而以往由墨西哥移民来完成的农业生产任务。尽管俄克佬同本地人一样都是白人,但被当作“卑微和异化的社会集团”来对待。称某人为俄克佬,就像称某人为江北佬(老江北)一样,成为一种流行的贬义措辞,意谓落后、贫穷、低劣。最后,尽管俄克佬是一个公认的加利福尼亚族群集团,但俄克族群最初不是由移民自己建构的身份,而是他们同加利福尼亚本地人发生关系的产物。^③同样,苏北族群不是基于传统,而是在上海被建构的。

尽管加利福尼亚的俄克佬同上海的苏北人之间有着种种相似之处,但这种类比仍是不完善的。据历史学家詹姆斯·格雷戈里说,俄克佬身份是同阶级相联系的。俄克佬这个名称本质上是指下层阶级的一个隐喻。来自俄克拉荷马和西南部其他州份的移民在洛杉矶和旧金山,甚至在中央谷找到了体面的工作,他们并未被人瞧不起或被斥为俄克佬。格雷戈里告诉我们,俄克佬这个陈年旧称“从来不是意指所有西南部人的”。

中产阶级的新成员几乎没有遭到怨恨或不尊重。即使是在反移民运动的当口上,大多数人还是得到了同经济地位与之相仿的其他白人一样的基本尊重。俄克佬这个陈年旧称首先不是一个地区偏见问题……阶级是根本的划分线。俄克佬的外人集团包括了非西南部的人,而社会身份体面的自己人集团则吸收了某些西南部人。^④

一个人的原籍远不如他或她的职业重要;地区差别之所以显眼,只是为了将穷苦白人同富裕白人区分开来。

然而在上海,阶层同籍贯之间的关系要复杂得多。一方面,江南人与苏北人之间的区别在很大程度上是以阶层差别为基础的。苏北人这种称呼明

* “俄克佬”(Okies),来自俄克拉荷马等州的人,故名。——译者注

显是意指下层人的一个隐喻,该名词系指贫穷受侮辱的人。在上海,阶层是由籍贯来建构的,籍贯的建构是阶层话语的组成部分。而且,正是因为这类身份同阶层难分难解地联系在一起,因而籍贯就具有族群涵义。

另一方面,苏北人这一社会类别的建构并不是严格的阶层现象;一个人的原籍的重要性绝不亚于这个人的职业。一些苏北人试图隐瞒其出身,但他们的身份不可能因阶层流动性而超越。20世纪40年代土改逃亡的富豪地主可能像“苏北人”一样被人瞧不起,逃荒的穷苦农民也是。换句话说,最最要紧的事情不止是阶层。族群性与阶层分野多半交相叠合,族群性强化了阶层分野,但族群不可归结为阶层。

要弄清什么东西在上海最要紧,必须比照中国的情况加以考量,只有某些中国人被称为族群。实际上,在中国最通常称之为族群的那些集团在理解上也许同上海苏北人的经历最不相干。中国的族群研究经常聚焦于少数民族:非汉民族,如苗族、彝族、维吾尔族、蒙古族、藏族。尽管近期许多研究表明,界定这些少数民族的族群身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⑤但他们同汉族的种族和文化区分则是无可争议的。大多数少数民族生活在边陲地区,因而不是内陆省份和沿海省份族群概念的主要面。换句话说,如果说在全中国族群式关系的发展取决于非汉少数民族的存在,那就找不到什么族群,或者说根本就没有族群。本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揭示族群身份是怎样在汉族本身的人群中得以建构的。

形形色色的中国人群与其说像少数民族不如说更似苏北人,这些人群至少在清代大部分时期里被认为是落魄失意、受人歧视的。诸如浙江的“堕民”,山西和陕西的“乐户”,广东的“船民”一类的群体都沦为完全不同于且低于其余汉族人的地位。他们不得应科举,入另册以别于“良民”,其妇女不许缠脚以抬高地位。^⑥同上海的苏北人一样,这些集团的成员全是汉人,但他们的落魄地位严格地按职业而定。

同苏北人更为相似的是遍布中国各地的形形色色不计其数的移民群体,这些群体的成员也都是汉人。最明显的比照是中国东南部的客家人(北方官话,即“客民”之意)。同苏北人相仿,客家人是一群移民,有别于本地人,主要以方言相区别。他们也像苏北人那样成为偏见的对象,说他们穷,是没有教化的乡巴佬,不文明。然而,同上海的苏北人正好相反,客家人并没有一致的原籍:他们的祖先据说在公元四世纪迁离河南,虽然他们大多数是唐代福建移民的后裔。中国东南部某些地区几乎成为清一色的客家社

会。^⑦客家人自认为不同于他们那些讲粤语的邻居；他们把自己看作宋代官宦的后裔，相反，讲粤语的本地人则据称是土著蛮人的后裔。^⑧

中国其他地区的移民就不如客家人明显了。例如，明清之际来自福建和粤北的移民定居在江西的山麓地区。尽管这些移民特性殊异，但本地人认为他们全是清一色同类流民或客民，用这贬义称谓称呼他们。本地人对这些流民的敌对情绪基于他们相对贫困以及方言和文化习俗之不同。^⑨江西当地人在清代也迁移了。大批江西人定居湖南时，他们与湖南本地人之间的冲突日甚一日。为了把自己同卑微的江西移民区别开，湖南人认为这些移民是非汉族的部落人，虽然这些所谓的蛮人逐渐主导蓬勃发展的商业，从而最终在经济上压倒了本地人。^⑩问题不在于江西的流民或在湖南的江西蛮人是否天生是族群，这个问题不是研究他们的学者提出的。相反，这两个个案揭示了上海苏北人的经历是怎样成为全中国范围内移民与本地人之间对抗性关系这个更大范围历史的一部分的。^⑪

中国境内的移民产生了籍贯概念。中国人历来总是把他们的出生地同他们的籍贯区分开，籍贯系指他们祖上的故土。对于正式文档来说，以及就识别自己与他人而言，原籍至少同他的出生地一样重要。顾德曼在她关于上海同乡会组织和意识的研究中指出：“原籍概念是传统中国个人身份必不可少的组成成分。一般说来，[这]是陌生人之间相互打听的第一件事，是记录一个人(姓名和化名之后)的第一个特征，是个人涉讼前要被查明的第一个事实。”^⑫

然而，籍贯是一种有伸缩性的建构：个人可以决定哪一代人的故乡作为他或她的原籍；而且，原籍可以指特定的村、区、市或省份。正因为原籍对一个人的身份十分重要，因此，要说明一个人的原籍殊非易事。

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早已认识到籍贯对于中国人的自我和群体观念十分重要。何炳棣的行帮研究是第一篇唤起人们注意原籍在中国的重要性的作品；籍贯和同乡关系在施坚雅的社会流动战略研究中有所暗示：地方性怎样培育人的具体本领而后传输到中国各地——山西钱庄老板、宁波商人，等等。^⑬同样，苏珊·曼分析了上海的宁波人如何得以凭借同乡关系建立起强大的社群。^⑭詹姆斯·科尔也记述了离开故乡的绍兴人依靠同乡关系的历史。^⑮稍后，苏珊·纳昆和伊芙琳·罗斯基在她俩的有关19世纪中国历史的著作中指出，“同乡是离开故园到异乡客地从业的人们相依相助时作为根本手段最经常提及的”。^⑯尽管同乡关系的作用在戴维·斯特兰德关于北